

载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11年第6期

中国文化中的博物学传统

江晓原

（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，200030）

近年刘华杰教授大力提倡复兴博物学，欲以此为救助当下唯科学主义泛滥之解毒剂，并进而上升至理论高度，遂有“科学史之博物学编史纲领”之议，鄙意极为赞同。前不久与华杰、刘兵两教授对谈，三人对博物学编史纲领获如下共识：**以人类生态环境和可持续生存为基本价值，中兴博物学，重写科学史。**

退而思之，博物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虽无其名，实有其实，若隐若现之间，自有一传统在。本人既好古成癖，何不将有关线索初步整理一番，或可为华杰教授提供偏师之助也。

博物学是一种世界观

已故科学史前辈刘祖慰教授尝言：古代中国人之处理知识也，如开中药铺，有数十上百小抽屉，将百药分门别类放入其中，即心安矣。刘教授言此，其辞若有憾焉——认为中国人不致力于寻求世界“所以然之理”，故不如西方之分析传统优越。然而今日视之，此种处理知识的风格，正与博物学精神相通。

与此相对，西方之分析传统致力于探求各种现象、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，以此解释宇宙运行之原因。自古希腊开始，西方哲人即孜孜不倦建构几何模型，欲用以说明宇宙如何运行，其最典型代表，即为托勒密（Ptolemy）宇宙体系。

比较两者，差别即在于：古代中国人主要关心外部世界“如何”运行，而以希腊为源头的西方知识传统（西方并非没有别的相关知识传统，第未能光大耳），更关心世界“为何”如此运行。在科学主义“缺省配置”语境中，我们习惯于认为“为何”是在解决了“如何”之后的更高境界，故西方的传统比中国的传统更高明。

然而考之古代实际情形，如此简单的优劣结论未必能够成立。以天文学言之，古代中国人并不致力于建立几何模型去解释七政（日、月、五大行星）“为何”如此运行，但他们用抽象的周期叠加（古代巴比伦也使用类似方法），同样能在足够高的精度上计算并预报任意时刻的七政位置。而通过持续观察天象变化以统计、收集各种天象周期，同样可视之为富有博物学色彩之活动。

如从科学主义“缺省配置”语境“升级”，则西方模式的优越性将进一步被消解。例如，按照斯蒂芬·霍金（Stephen Hawking）在《大设计》中的意见，他所认同的是一种“依赖模型的实在论（model-dependent realism）”，即“不存在与图像或理论无关的实在性概念（There is no picture- or theory-independent concept of reality）”。在这样的认识中，我们以前所坚信的外部世界的客观性，已经不复存在。既然几何模型只不过是对外部世界图像的人为建构，则古代中国人干脆放弃这种建构直奔应用（毕竟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只需要知道七政“如何”运行），又有何不可？

传说中的“神农尝百草”故事，亦可在类似意义下得到新的解读：“尝百草”当然是富有博物学色彩的活动，神农通过此一活动得知哪些草能够治病而哪些不能，然而在此一传说中，神农显然不会致力于解释“为何”某些草能够治病而某些不能，更不会去建立“模型”

以说明之。

从《博物志》看中国博物学传统的表现形式

在中国儒家经典中，博物学精神有颇为充分的体现。孔子曰：“小子何莫学夫诗？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；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同为儒家经典之《诗经》，其博物学色彩之浓厚可知。例如，日本人冈元凤的《毛诗品物图考》，详述《诗经》中提到的各种植物，并逐一附有手绘精美图形，曾让我爱不释手。

古代中国人的博物学传统，当然不会仅限于“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”。体现此种传统的典型著作，首推晋代张华《博物志》一书。书名“博物”，其义尽显，此书从作者到内容，无不充分体现作为中国博物学传统表现形式之代表资格。

张华（公元 232~300）字茂先，范阳方城（今河北涿州）人，出身贫困，曾经牧羊，但好学不倦，博览群书，从政之后，遂成名士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记载“诸名士共至洛水戏”，张华获得“张茂先论《史》、《汉》，靡靡可听”的评语。

关于《博物志》，在王嘉《拾遗记》（当时一部同类著作）中有一传说，谓张华写成《博物志》四百卷，上奏晋武帝，得到“记事采言，亦多浮妄”的审阅意见，令其删改。张华遵命，删节成原著之四十分之一，遂成如今传世之十卷本。此说并不十分可信，姑妄听之而已。但我们分析十卷本《博物志》，仍然足以作为典型。

《博物志》中内容，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：一、山川地理知识；二、奇禽异兽描述；三、古代神话材料；四、历史人物传说；五、神仙方伎故事。此五大类，完全符合中国文化中的博物学传统。兹按上述顺序，将此五大类每类各选一则，以见一斑：

《考灵耀》曰：地有四游，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，夏至地下南而东三万里，春秋两分其中矣。地常动不止，譬如人在舟而坐，舟行而人不觉。七戎六蛮，九夷八狄，形类不同，总而言之，谓之四海。

蜥蜴或名蝮蜒，以器养之以朱砂，体尽赤，所食满七斤，治捣万杵，点女人支体，终年不灭。唯房事则灭，故号守宫。《传》云：东方朔语汉武帝，试之有验。

昔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，帝放之此野，相抱而死，神鸟以不死草覆之，七年男女皆活，同体二头四手，是蒙双民。

《列传》云：聂政刺韩相，白虹为之贯日；要离刺庆忌，彗星袭月；专诸刺吴王僚，鹰击殿上。

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达，其论养性法则可施用，大略云：体欲常少劳，无过虚。食去肥浓，节酸咸。减思虑，损喜怒，除驱逐。慎房室，春夏施泻，秋冬闭藏。详别篇。武帝行之有效。

以上五则，深合中国古代博物学传统之旨。第一则，涉及宇宙学说，且有“地动”思想，故为科学史家所重视。第二则，为中国古代长期流传的“守宫砂”传说之早期文献，相传守宫砂点在处女胳膊上，永不褪色，只有性交之后才会自动消失。第三则，古代神话传说，或可猜想为现代之“连体人”。第四则，关于三位著名刺客的传说，此三名刺客及所刺对象，历史上皆实有其人。第五则，涉及中国古代房中养生学说。“青牛道士封君达”是中国房中术史上的传说人物之一。

对于《博物志》，不可视为神奇。事实上此类著作在中国古代相当普遍，绝大部分传世文人笔记作品中，皆有此种博物情怀。兹稍举宋代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一例——此书被李约瑟誉为“中国科技史的坐标”，世人遂多以为其书至为“科学”，其实书中同样有与《博物

志》类似内容，只是比例较小而已。《梦溪笔谈》卷二十“神奇”中有云：

天圣中近辅献龙卵，云得自大河中，诏遣中人送润州金山寺。是岁大水，金山庐舍为水所漂者数十间，人皆以为龙卵所致。至今匿藏，余屡见之，形类色理都如鸡卵，大若五斗囊，举之至轻，唯空壳耳。

此类记载，在中国历代笔记作品中实属汗牛充栋，无烦多举。

中国博物学传统在当下的积极意义

如以上述六则笔记作为中国文化中博物学传统之代表，或者有人会问：这算什么传统？难道是一个“怪力乱神”的传统吗？我的意见是——这是一个**能够容忍怪力乱神的博物学传统**。而一个能够容忍怪力乱神的博物学传统，在当下社会中，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充当消解唯科学主义的解毒剂。

那么“子不语容忍怪力乱神”的名言，是否与儒家经典中的博物学精神相冲突呢？鄙意以为并无冲突。“子不语容忍怪力乱神”并不等于孔子排斥怪力乱神，只是表明孔子本人不谈论怪力乱神而已——谈论、处理怪力乱神，本来就是巫覡们的职责，不是孔子给自己设定的职责，故孔子不谈论这类话题。

进而言之，能够容忍怪力乱神，这一点不仅不是这一传统应被批判否定的理由，恰恰相反，这一点可以视为中国文化中博物学传统的中国特色。

那么为何一个能够容忍怪力乱神的博物学传统，可以在当下社会中充当消解唯科学主义的解毒剂？这必须从“当代科学”的狭隘和傲慢说起。

“当代科学”——当然是通过当代“主流科学共同体”的活动来呈现——对待自身理论目前尚无法解释的事物，通常只有两种态度：

第一种、坚决否认事实。在许多唯科学主义者看来，任何现代科学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，都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，或者是**不能承认**它们存在的。比如对于 UFO，不管此种现象出现多少次，“主流科学共同体”的坚定立场是：智慧外星文明的飞行器飞临地球是不可能的，所有的 UFO 观察者看到的都是幻象。又如对于“耳朵认字”之类的人体特异功能，“主流科学共同体”发言人曾坚定表示，即使亲眼看见，“眼见也不能为实”，因为世界上有魔术存在，那些魔术都是观众亲眼所见，但它们都不是真实的。“主流科学共同体”为何要坚持如此僵硬的立场？因为只要承认有当代科学理论不能解释的事物存在，就意味着对当代科学至善至美、至高无上、无所不能之形象与地位的严峻挑战。

第二种、面对当代科学理论不能解释的事物，将所有对此类事物的探索讨论一概斥之为“伪科学”，以此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以求保持当代科学的“纯洁”形象。此种态度颇有“鸵鸟政策”之风——对于这些神秘事物，你们去探索讨论好了，反正我们是不会参加的。

以上两种态度，最基本的共同点即为断然拒斥“怪力乱神”。“主流科学共同体”中的许多人相信，这种断然拒斥是为了“捍卫科学事业”，是对科学有利的。

至此，问题已经相当清楚：一个能够容忍怪力乱神的博物学传统，必然是一个宽容而且开放的传统；同时又是一个能够敬畏自然，懂得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。这样的传统至少可以在两方面成为当代唯科学主义的解毒剂：

一、在这个传统中，对于知识的探求不会划地为牢故步自封。事实上，即使站在科学主义立场上，也可以明显看出，断然拒斥怪力乱神实际上对于科学发展是有害的。考之欧美发达国家，彼处科学技术发达领先固无疑问，但彼处对怪力乱神更为宽容的社会氛围，则常被我们视而不见。“伪科学”与“真科学”之间本来无法划出明确界限，前者其实可以成为后者发展的温床之一。

二、也许是更为重要的，以敬畏自然、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，矫正当代唯科学主义理念带来的对于自然界疯狂征服、无情榨取的态度——此种态度与环境保护、绿色生活等理念皆有直接冲突。

当然，肯定中国文化中的博物学传统在当下的积极意义，并不等于盲目高估此一传统的历史成绩。应该承认，按照今天流行的标准，在以往历史中，此一传统在物质科学发展方面的贡献，不如西方科学的分析传统。但是未来情形又会如何？则是现在无法预测的。况且评价的标准也会随时代而改变，有朝一日此一传统或能发扬广大，我们自当乐观其成。